

鯉魚門天后顯靈

風雨驟停天后顯

傳說1952年某夜，天后娘娘報夢給長侍鯉魚門天后宮的廟祝劉火燐，要求村民重修天后宮。廟祝夢醒後即告知鄉長羅平報夢一事，但鄉長認為這只是廟祝的片面之詞，並不可信，他說除非天后娘娘親自降靈方有「根據」。過了數天，廟祝再得報夢，夢中天后定出顯靈日期。

1953年四月初五，整個上午也是暴風暴雨，但中午卻突然轉晴，天后宮天空之上有雲霞凝聚，乍看形同天后之相，鄉長見狀相信廟祝報夢之說。正當羅鄉長欲請攝影師攝下天后之像時，天后忽附於廟祝身上，說定要請得「蕭雲庵」（某日報記者）來攝影，剛巧記者蕭雲庵正在茶果嶺的居所內，立刻奉命到天后宮，為天后娘娘「留影」。及後，鄉長立刻捐出三百大圓，作修葺天后宮之用。¹



▲ 相傳在1953年顯靈的天后的照片



位於海邊的鯉魚門天后廟 ▶

鯉魚嬉水變海門

巨鯉嬉戲不能擾

有一傳說，謂數十年前有一位名作曲家的太太，途經香港時作了一首名為「鯉魚門歌」的名曲。歌曲載說鯉魚門盛產鯉魚，還註釋說中國人過年必吃鯉魚，因鯉魚諧音吉利，又附會中國傳統「鯉魚躍龍門」的傳說，塑造鯉魚門有鯉魚跳過港口而化身成龍的美麗神話。

而華僑日報亦於1947年載述一則關於鯉魚門名字的傳說。傳說鯉魚門的兩岸原本十分寬廣，而當時亦有不少漁船出入港口捕魚為生。一天晚上，一名漁人正在鯉魚門港口點燈打魚時，忽現看見兩條巨大的鯉魚在水上嬉玩。漁人正想捕捉之時，不料隆隆一聲，轉眼之間，兩岸隆起兩山，海峽變得狹窄起來，故鯉魚門之地形、名字亦因此「鯉魚化石」而來。



▲ 分隔港島及九龍東岸的鯉魚門海峽

鯉魚門礁石

高人知曉礁石動

鯉魚門有一掌故，和其海底礁石有關。據說鯉魚門海下有不少礁石，而礁石的位置會隨潮汐變換而流動，故不能掌握礁石的正確位置，而不論甚麼類型的船隻，也有觸礁的危險，故當時在鯉魚門一帶行駛的船隻和航行者甚為擔憂和煩惱。

但當時有一位姓張的水上人，他卻對於鯉魚門海下的情況甚為了解，對海底礁石的數量和大小也十分熟悉，後來他更曉得礁石每天按時

的流動情形，並且是絲毫不差。張氏亦因此獲政府的邀請，指導探測礁石的方法，希望他協助英國商船順利進出鯉魚門港口，以便省卻由香港仔繞上珠江口、再駛進廣州進行貿易的時間。然而張氏對此不表答允，後來英政府賦予張氏於鯉魚門海域獨享一項專利領海權，負責安排船隻安全進出港口，並且從中獲利。自此，大小船隻進出港口也平安無事。

¹ 參考鯉魚門天后廟內有關之碑記。

鯉魚門許願樹

大埔林村以外，鯉魚門也有「許願樹」，樹立於鯉魚門已有接近五十餘年歷史，居民都稱呼為「許願樹」或「百年古樹」。相傳此樹對祈求姻緣極其靈驗，所以每年也有不少男女前來許願，若果真的如願便需回去謝恩。據說，曾有善信遲遲未有身孕，經誠心祈求後果得一子，故不少人相信「許願樹」能使人心想事成。

村內的鄉紳希望透過重新規劃，將這老榕樹變成供人祈福的「許願樹」，但嚴禁拋擲寶牒，改於四周樹立仿古木牌，供遊人掛上心願牌等。不過，許願樹最近卻傷痕累累，樹根長期被石屎及磚頭圍封，不能正常生長，樹上亦掛滿吊飾，長此下去可能會使許願樹樹枝折斷甚至死亡，¹必須小心保育。



▲ 茶果嶺求子石(卵石)至今仍受鄉民膜拜

茶果嶺求子石

茶果嶺求子石是位於茶果嶺天后廟外的一對天然巨石，又稱為「卵石」，相傳有求子得子之效。

民政官求石得子

傳說在清代以前，已有不少多年不孕的水上漁民、陸上村民誠心禱告，膜拜求子石後即求子得子。而在嬰兒滿月時，父母只要根據傳統，攜帶三牲、酒、薑、冬菇、茨菇、紅雞蛋及香燭再來酬謝求子石，便能平安大吉。根據茶果嶺村所建的告示牌所述，曾有一名民政官久婚而無兒無女，在每年的天后寶誕，都攜同妻子一同前往廟宇參神禱告。恰巧在一次的天后寶誕後，他們聽說居民所言，嘗試膜拜求子卵石。結果其妻子次年即產下一兒。民政官後來在卸任回國時，更攜同妻兒前來天后廟參神及向求子石謝福。



▲ 求子石昔日面貌

傳奇人物陳發仔

空難金條從天降

傳說1947年2月25日，一架滿載一批價值一千五百萬美元黃金的菲律賓航空公司C47「空中霸王」運輸機失事，撞到大潭篤柏架山上，機員全數死亡，而所載金條則飛散各處。陳發仔是筲箕灣人，他便和兩名夥計在晚上到山上拾取金條，並將它們埋下土中，隔了一段時間後掘出金條變賣。其後陳發仔在鯉魚門買了不少店舖和土地，成為鯉魚門富甲一方的大財主。

藍田邨第十五座的飛龍傳說

水龍隱身十五座

1970年8月，藍田邨第十五座徙置大廈落成，最與別不同的地方是大廈外牆上繪有一條飛龍。這是因為藍田邨第十五座是全港第五百座公屋，¹同時亦是第一幢第六型的徙置大廈，²基於此才在外牆繪上飛龍慶祝。不過，坊間卻流傳著關於此飛龍的傳說。

其中一個說法是將飛龍視為制止水災的靈獸。七十年代的藍田經常暴雨連連，極影響居民生活，居民流傳這個說法，是認為藍田有水怪作祟，繪上飛龍是為了鎮壓水怪。



▲ 昔日的藍田邨第十五座是工務局興建的第五百座公屋，故工務局在外牆繪畫飛龍，並舉行紀念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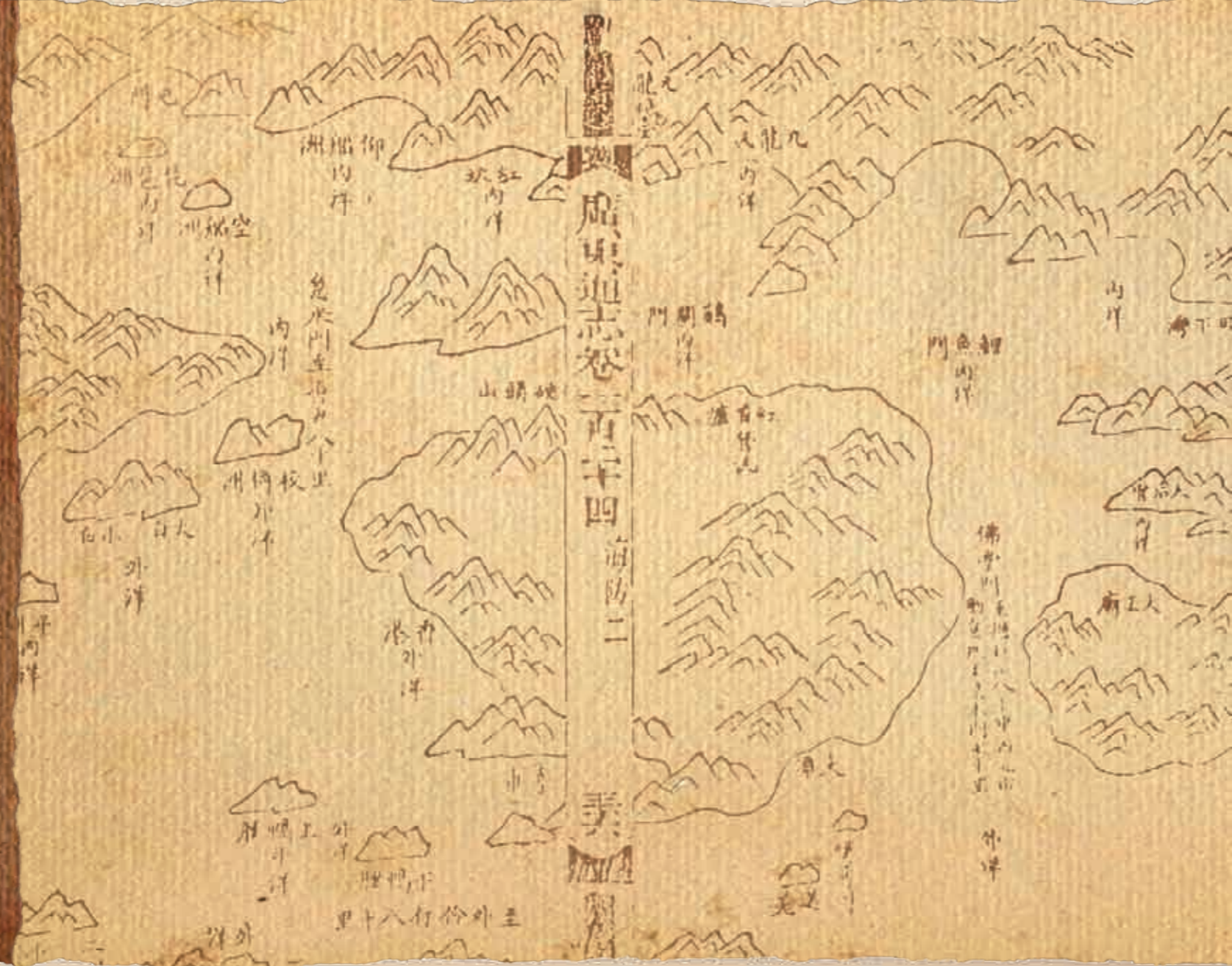
另一個說法則指飛龍其實是水龍。傳聞興建藍田邨時，地面忽有血水滲出，但卻不見任何屍體，工人說好像把一條類似龍的物體鋤傷，因此，政府為了安定民心，便在十五座外牆繪上飛龍。不過事情尚未結束，十五座入伙後，有人說在半夜聽到水滴聲響，次日清晨便看到整條走廊都是水。曾有人半夜聽到水滴聲，偷偷往門外看，卻不見任何人影及可以弄濕整條走廊的工具，但整條走廊都是水，因此有人傳言每晚水龍移動時，把走廊弄濕。³

¹ 《星島日報》：A08,港聞,星島專訪2007-07-17

¹ 觀塘歷史：http://www.kwuntong.org.hk/tc_submain3.htm

² 香港地方：<http://www.hk-place.com/db.php?post=d005019>

³ 1970年的飛龍傳說-活在觀塘：<http://kwuntong.wordpress.com/2007/04/30/1970%E5%B9%B4%E8%97%8D%E7%94%B0%E9%82%A8%E7%9A%84%E9%A3%9B%E9%BE%8D%E5%82%B3%E8%AA%AA/>



▲ 中華造船廠的創始人王華生先生，攝於船廠辦公室內

王華生先生專訪

王華生先生有豐富的工程及造船業務經驗，他於1925年在廣東省東莞市石排鎮出生，十四歲時來港，在九龍船塢當學徒，1941年創辦中華風電焊鐵工廠，六十年代在油塘灣創辦享負盛名的中華造船廠，其後不斷拓展業務，現為王氏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及雅高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的集團主席。王華生對於觀塘區體育發展有重大貢獻，為觀塘體育促進會創會會長，另外亦擔任觀塘少年警訊、觀塘社區發展協會、觀塘兒童合唱團的創會會長。

四十年代，王華生來港後三年，以年僅十七歲之齡，獨資創辦中華風電焊鐵工廠，業務主要是承接船舶的修造鐵器焊接工程。該廠成為他日後在香港的船廠業務的踏腳石。五十年代，王華生首次展開跨國業務，在當時英屬婆羅洲承建首座在東南亞服務的鑽井平台「東方勘探者號」，自此業務更蒸蒸日上。六十年代，在觀塘油塘灣開設中華造船廠集團及中華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中華造船廠佔地甚廣，有足夠的運作空間，早期主要以製造躉船為主。他的兒子王敏剛在美國加州大學完成船舶設計課程，回港後開始設計水警輪，並設計一艘全球第四大馬力的工作船，功能可與南北極拯救船媲美，該艘輪船後來被英國政府徵用作戰爭用途。中華造船廠於七十年代上市，成為一家公共股份公司，參與國際海上造船及探油設備工程。

王霖先生專訪

避禍返港求安定

王霖先生於1919年在香港出生，小時候就讀的育才書舍，為當時香港三大官立英文書院之一，每月學費只是五元。他從第八班升上第四班後，與同學回到內地升讀中學，畢業後適逢抗戰，戰況激烈，為避戰禍，王霖回到香港，經朋友介紹到巴士公司任職，五十年間盡歷觀塘發展。1967年籌組觀塘街坊會，參與區內事務。1975年與周梁淑怡女士、陳凌峰先生獲香港政府委任為中央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1976年獲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直至1985年。1977年全港第一個區議會在觀塘成立，王霖獲委任為區議員。

1937年，他剛回港不久，經一位任職司機的朋友介紹，到巴士公司工作，擔任車上售票員，月薪十八元，當時的警察月薪為二十一元，文員二十二元左右，與當時被譽為薪金優厚的警察及文員相比，薪金相差不遠，已算是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他最初擔任售票員，其後轉為稽查，再升任總稽查，1967年成為觀塘區車務主任。1977至1983年，調任荔枝角總公司任職公關經理，1987年退休，服務巴士公司五十載。

最初巴士公司共有巴士一百零一輛，發展至今已有多千多輛雙層巴士。初時的巴士只有單層，約可接載三十餘人，巴士上有三位工作人員，包括司機、售票員及守閘員，巴士分別設有頭等座位及三等座位，頭等座有梳化、三等有木座位，當時廠房不足以存放所有巴士，巴士會放置在露天站頭的地方，俗稱「瞓街」。



▲ 從事巴士相關工作數十年的王霖先生



▲ 應邀為少年警訊海報設計比賽頒獎嘉賓



▲ 與董建華(中)、霍震霆(右二)、及藍鴻震(右一)於申辦亞運時的合照

除了中華造船廠以外，他又與馬來西亞政府合作，建立當地最大規模的修船自昇平台造船廠；沙巴造船廠，另外又與船王董浩雲先生合作，在香港創立歐亞造船廠，製造深海探油台。八十年代，因為內地的工商業發展極有潛力，於是集中拓展內地業務，發展多元化，包括酒店、地產投資、零售業、巴士運輸、重工業、造船等。他是較早期回到內地投資的其中一位香港商人。

隨着陸路及空中交通工具快速發展，船隻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此外，由於造船業牽涉甚廣，且與國防息息相關，中國政府多津貼國內造船廠。植根於香港而屬於商業性質的中華造船廠自然不能得到財政支持，難以與國內船廠競爭，生存空間日少。王華生終於在1991年把中華造船廠集團的股份出售，其後船廠地皮被多間地產商分投，包括新世界及恆基地產等。及後，王氏家族重組業務，以王氏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為家族業務的旗艦公司。

王華生從事工商業達五十多年，一直不忘貢獻社會，尤其是以往船廠所在的社區——觀塘，他更積極推廣體育活動。觀塘早期為一片荒蕪之地，及至工業發展，區內人口大增，其中又以工人階級佔多。那時工人生活刻苦，工作時間極長，運動機會甚少，加上區內運動場所不多，不少人身體虛弱。區內青年一輩亦開始增加，雞寮附近一帶常有小孩及青少年在街頭玩耍，不少被迫加入黑社會。有見及此，王華生聯同其他有志人士，自籌經費成立體育會，籌辦籃球、足球、排球等活動，由民政主任負責組織，文康體負責籌備活動。該體育會便是「觀塘體育促進會」。

王華生年青時十分好動，在眾多運動中獨愛游泳，每次到泳池，總要游上過千公尺才罷休。



▲ 曾為民聯會盡心盡力工作的伍兆祥先生

伍兆祥先生專訪

曾居觀塘不同處

伍兆祥先生於1950年(即發生電車工人罷工那年)到港定居，與父親在中環共同生活，最初在西營盤讀書，初中輟學後，到洋行任職信差等，及後更在九龍城、長沙灣、土瓜灣等地做鋼窗鐵閘工作，同時修讀夜校。轉往開源道工作後，於「廣州鋼窗廠」任技工。1972年與侯瑞培先生共組「觀塘民眾聯誼會」，退休後曾擔任全職區議員。

伍兆祥自七十年代起遷居觀塘，曾在家樂街、仁愛圍、牛頭角、茶果嶺等地居住，婚後居於瑞和街，同時申請輪候公屋。由於政策規定，家庭成員必須有三人以上才可申請公屋，兒子出生後也未能獲配單位，他們先搬到茶果嶺居住，後來多添一子才被分配到順天邨，其後調遷秀茂坪。

工廠漸多受污染

五十年代，觀塘發展為衛星城市，出現大量工廠大廈。開源道是觀塘的邊緣地帶，工廠多集中在海邊，現今的淘大花園原為「醬油廠」，對內有西洋菜地。當時紡織業興旺，較大規模的有「華南染布廠」、「南洋紗廠」、「華僑紗廠」，數間大廠均集中於觀塘。除了紡織廠以外，尚有鋼窗廠，但出名的鋼窗廠不多，只有「廣州鋼窗廠」、「豐明鋼窗廠」、「金門鋼窗廠」等。伍兆祥在廣州鋼窗廠工作，該廠樓高兩層，只有約百多個工人，但已是同期較有質素的工廠。該廠製造的

從註冊成立街坊會、招收會員、收取會費，以至籌備觀塘區節，王霖見證整個成立過程。剛開始只有數百人的街坊會一直發展至今。當時雞寮的治安還不是很好，街坊會卻能在雞寮招募義工，協助街坊會的工作。街坊會對長者十分關照，當時觀塘居民對巴士的需求甚殷，居民在中途站經常要輪候多時才能上車，尤其是在繁忙時段，情況更為緊張。有見及此，王霖調派空車往中途站接載乘客，待巴士半滿後，再駛往其他地方。

王霖認為，昔日觀塘治安雖然欠佳，而且居民普遍知識水平不高，但刻苦耐勞。觀塘現今繁榮興盛，實有賴居民的努力，為觀塘的發展打好基礎。

1967年暴動期間，巴士公司在觀塘設立分廠。王霖在巴士目睹的事情甚多，不少人趁着繁忙時段，明目張膽乘搭「霸王車」，有些則耍小聰明，最常見的是先從其他途徑探知巴士公司職員的名字，上車後對售票員表示認識該名職員，假如售票員認識他所說的職員，便不會收取該名乘客的車費。有一回，王霖逮着一名乘客，那名乘客卻表示認識「王霖」，王霖不禁失笑，因為他根本不認識該人。那名乘客被送往警署，其後被法庭判罰款二十元。

由於巴士乘客眾多，車上時常潛伏「鼠竊狗偷」，專門向那些疏於防備的人下手。即使是稽查，也要好好看管自己的財物。售票員時刻盡量把擺放財物的手提包貼近心口，以策安全。不少竊賊乘着與對方談話或假意詢問，分散獵物的注意力，所以職員盡可能不與可疑人物對話。

除了車上的治安問題，巴士司機與小巴司機，兩者經常因為利益衝突而產生磨擦，王霖形容，小巴司機品流複雜，也有不少人混有背景。最常見的爭執是關於上落客位置問題。當時巴士最多只可接載三十多人，體積與小巴差不多，因此小巴司機經常在爭執時用車身向巴士碰撞，問題鬧大時，通常要出動雙方代表談判。

志在謀求好福利

觀塘第一個街坊會在1967年至1968年左右成立，王霖聯合王愷、張和等發起組織街坊會，理事長出錢出力之餘，以籌款活動取得資金。六十年代區議會尚未成立時，街坊會的角色等於現今的區議會，尤其是暴動期間，街坊會對居民提供不同援助，代表觀塘居民向政府表達意見，同時促進居民之間的情誼。

鋼窗噴有鉛水，較其他沒有指定這個工序的工廠高級。工人要加入工廠，多需熟人介紹。由於伍兆祥早期在工業區工作，整天都面對工廠污染，感受特別深刻，當時街道雖種有樹木，卻大多枯死。

伍兆祥在午飯或公餘時，偶然也會到裕民坊閒逛，那裏有好幾間出名食肆，例如東莞酒樓及大同酒樓等四間中式茶樓，又有三間中式食肆。雖然工人生活較拮据，但茶樓市道仍然不錯，客人光顧時都會享用「一盅兩件」，區內較少大筴地形式的攤檔，但在以前的巴士總站(現時的月華街)附近攤檔出售的牛雜、東風螺十分出名，碼頭附近亦有極受歡迎的紅豆沙檔，令人回味。

社會問題難解決

在秀茂坪任職區議員時，伍兆祥面對不少求助個案，使他感到有心無力，當幫不上忙時，亦往往替求助者心酸。伍兆祥每逢星期二晚上會見市民，秀茂坪邨重建期間最多人需要協助，經常都與求助市民談到很晚，曾有一人在凌晨一時十五分才離開他的議員辦事處。屋邨不少個案涉及老夫少妻，曾有一名老翁向伍兆祥求助，說他的年輕妻子拿了他數百元不願歸還，更提出離婚，事情未有解決，老翁一時想不開跳樓身亡，有關個案均反映嚴重的社會問題。

至今仍有些老人受到家人虐待，但以往社區及房屋的政策較為僵化，不能為他們分戶，所以矛盾不斷產生，直至最近才可讓有關人士以個人身分申請。不少問題往往與錢財糾紛有關，伍兆祥慨歎窮人往往奢望從賭博獲得錢財，欠下賭債時假如家人不提供協助，便可能產生暴力事件。區內亦多中港婚姻和新移民問題，有些人在內地結識年輕漂亮的女子，然後生兒育女，由於不能負擔家庭生活所需，妻子沒有生活費，便會來到香港向丈夫要錢，這是近年常見的家庭矛盾。



▲ 民聯會吸納社會基層，經常聚會



▲ 振基電子集團有限公司負責人周振基博士

周振基博士專訪

區內成長渡童年

周振基博士為振基電子集團負責人，小時候曾在觀塘協和大廈一五一號居住，中學畢業後到美國留學，1981年回港創業，憑着打拼精神創立振基電子集團公司，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歷史。公司以生產電子高科技原材料為主，包括SMT、半導體及電子消費產品等。

小時候，家庭生活曾一度因父親離世面臨經濟拮据，但其後兄姐分別擔任警隊文職人員訓練部門主管及花旗銀行觀塘分行經理，生活得到改善。後來，他的母親購入協和大廈一個單位，只需付出兩至三萬元，相較當時其他地區的樓價便宜一半，已算是觀塘較好的私人屋宇。周振基就這樣在觀塘度過難忘的童年。

歷盡挫折等閒事

周振基曾就讀牛池灣聖約瑟中學，後來到美國工讀留學，完成大學及碩士課程，儲蓄了二千多美元後回港發展。他撰寫了一份計劃書，獲得一位外國銀行家的信任，向他借款二十萬元以經營高科技生意，於是他得以創業，回港後更於香港大學完成博士課程。周振基曾攻讀電子工程，加上順應時勢，便創立振基電子集團有限公司。自八十年代起，大批中小型企業如雨後春筍在觀塘出現，

繼紗廠後，電子工業興起，主要因為客戶多在九龍灣一帶，方便貨物交易，著名的電子廠包括雷達電子廠及卡達電子廠等，基於該種有利形勢，周振基也投身電子工業。

周振基在營商期間經歷兩大風波，其一是在1983年戴卓爾夫人到訪中國，會見鄧小平後，談判失利，香港經濟立即受到影響，歐洲銀行對香港沒有信心，借出的款項都要公司立即歸還。當時周振基借款合共二百萬元，他與客戶及銀行商討，但由於公司規模尚小，一些重臣對公司沒有信心，轉到外頭經營生意，使他失去大批人才；其二在九七回歸後，出現金融風暴，經濟不景，九八年物業價格變差，他必須將外國的資金調回香港以解燃眉之急。這段期間太太給予他極大支持，加上個人努力拼搏的精神，才能解決危機。周振基堅信，個人努力拼搏絕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由於形勢轉變，電子工業也隨之轉型。以往高科技生產多有美國及英國背景，八十年代流行的是原子粒及影音用的二極管。當時振基佔有超聲波Bonding材料市場供應量的七成，時至今日也有五至六成。九十年代起，電子廠逐漸遷離觀塘，很多工廠已遷往大陸，菲力普已經遷往葵涌。現今留在觀塘的多以寫字樓為主，營運規模不大，觀塘只被視為一個中途站，廠家多選擇在內地進行生產工序。

永遠沒有夕陽天

有人說製衣業是夕陽工業，但周振基不相信有夕陽工業這回事。他認為只要不斷創新、不斷改善設計及品質，只要產品在市場仍有需求，必定可創出一條新路。隨着電腦應用普及化，電子技術日益精進，電子工業仍有長遠的發展空間，例如「Surface Mount Technology」，就是把零件弄得小巧，利用金屬共融點的技術來縮小零件體積，該種先進科技並可應用於很多產品。周振基深信每個行業、每個人都沒有夕陽天，關鍵在於我們有否「奮發向前，力求進步」，只有停留在原地才是夕陽。



▲ 周振基與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合照



▲ 與前特首董建華交談



▲ 五、六十年代的涼茶舖



▲ 林健國先生

林健國先生專訪

居於觀塘四十年

林健國先生於1961年到港，經常到觀塘探望在工業區樓梯底工作的父親。由於位於西洋菜街的原居所成了危樓，他在1967年搬到秀茂坪居住，居於觀塘已有四十年之久。1973年，林健國成為大廈第一屆互委會主席。後被委任為分區委員會委員、觀塘民政署委員會委員，並擔任了六屆區議員，畢生在觀塘服務。

林健國居於秀茂坪期間，鄰近有安樂村及大聖村木屋區，該等木屋區沒有水電供應，經常出現偷電的情況，很容易引發火災。1982年年初，秀茂坪因而發生最大規模的火災，其後第一屆區議會推行改善供電計劃。

劃分成立兩警區

從以前的掃墓坪，到現在的秀茂坪，林健國一直目睹該區的轉變。雖然以前觀塘被稱為紅番區，但其實並沒有想像中差，只是一個環境較複雜的地區而已。觀塘是個位於市區的區域，其中有工業區、木屋區、廉租屋、徙置區等，是一個多樣化的地方。治安欠佳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在於觀塘地區的複雜組合，其二在於區外人到觀塘謀取利益，所以區內的警力發展亦有多次轉變。早期觀塘警力不足，質素參差，受賄情況嚴重，秀茂坪警區成立前，只有觀塘警區，1984年才成立秀



▲ 六一八雨災後清理災場，只見滿目瘡痍

茂坪警區，把觀塘分為兩部分。兩邊警區最初以街道劃分，所以在中間地帶治安明顯出現嚴重問題，成為「無王管」地帶。當時以曉光街作交界，曉光街以北屬秀茂坪警區、曉光街以南屬觀塘警區，交界附近有何明華中學、梁式芝書院、青松中學等三間中學，因為上述學校的位置與斜坡問題，令人難以判斷它們屬於哪個警區。有見及此，林健國向撲滅罪行委員會建議重新劃界，斜坡以上屬於秀茂坪警區，從此兩分區的管轄範圍變得清晰。

警民關係科在七十年代設立後，警民關係顯著改善。大廈組織可直接與警民關係社區聯絡員交換意見，如居民不希望報警或把事情鬧大，可通過該途徑處理。此外，警方曾設立屋邨派出所及「鄰理警察」，「鄰理警察」就是調配一批警察在派出所工作，與居民維持良好關係，反映實情。市民亦歡迎有熟稔的警員在附近工作，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而取消派出所及「鄰理警察」。

遷移市中心念頭

區議會曾構思遷移市中心的建議，時值翠屏邨重建，有人建議把翠屏發展為市中心，取代建設公屋，但隨即發覺建議並不可行，因為人的習慣不易改變，加上翠屏的面積比舊有市中心大不了多少。裕民坊、仁愛圍、瑞和街、物華街等加起來也是一個面積不小的市中心，只是太過集中在裕民坊而已，所以區議會主張盡早實行重建計劃。

區議會一直關注新移民問題。新移民不單指近年來港的新移民，因為觀塘本就是一個大量接納新移民的社區，早於五十年代工業發展初期已不斷吸納新移民。寮屋也是因應新移民問題而興建的，九龍灣也建有多個臨時安置區，以供未符合資格上樓的人士居住。早期政府容許市民在曉光街等自搭寮屋，後來才有政府的兩層臨屋，並引致十分嚴重的治安及衛生問題。當時九龍灣的臨屋有住戶搬往公屋，離開時未有清理棄置的食物，引來鼠患。另

外也有爆竊案件，如衣物被偷走等，警方雖有巡邏，但由於任何人也能查看簽到簿，容易讓竊賊避開警察的監視而偷竊財物。

早期的公屋過於擠迫，居民易生磨擦。小單位供兩名單身人士合租，大陸開放以後，大批新移民湧入，其中一人結婚後，夫妻生活不便。女性在百餘呎單位內與陌生男性一起居住，容易引起不安，亦沒有私人空間，所以居民往往提出分戶、調戶等。另一方面，早期公屋單位細小，十一歲以下小童作半人計算，四人家庭才獲配二百呎單位，小孩長大後更見擠逼，若兩個小孩為一男一女就更麻煩，可見早期房屋政策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



▲ 觀塘區的第二間警署：秀茂坪警署



▲ 位於鯉魚門道的觀塘分區警署



▲ 林珩輝先生

林珩輝先生專訪

林珩輝先生自1982至1994年出任觀塘區議會主席，致力為觀塘服務，處理市民難題，看盡人生百態。早於六十年代，他已進入觀塘，投身飲食界，開設深入民心的觀華酒樓，成為當時觀塘區數間有名酒樓之一。

酒樓食肆最興旺

林珩輝六十年代在深水埗東梅大廈居住，七十年代則居於廣播道。1986年將兒女及太太送往新加坡後，他搬到觀塘區，獨個兒住在德福。1997年離港到新加坡和家人團聚，後因不習慣當地生活，1998年回港轉居麗港城。雖然林珩輝居於觀塘區的時間不算太長，但曾出任區議會主席、觀塘體育會副會長，且是區內酒樓老闆，1994年又嘗試開設西餐廳。

人基本的需求總離開不了衣食住行四種，所以五十年代觀塘剛發展時，最早出現的是大批食肆。他們採取「同伙」的形式，茶餐廳在二樓，地下則是賣水果的店舖。後來有「天然」、「寶漢」、「百官」、「保華」、「觀華」等茶樓出現，為居民帶來不少選擇，豐富味覺上的享受。1964年，他家鄉的兄弟看準觀塘工業的快速發展，有大量的午餐及晚餐需求，於是邀他一起在觀塘開設觀華酒樓。1973年酒樓才剛成立，地方是租回來的，經營八年後才購入。

交通不便亦造就了酒樓的興旺。當時觀塘尚未有地鐵，要進入觀塘必須先在彩虹繞一圈，步行也需花上數小時，很多人因此不願意到觀塘工作，如無必要也不會到那裡。這種封閉環境下，酒

樓的生意無形中被帶動。當年的娛樂活動不多，而且交通不便使觀塘的人有如被困在籠子裡一樣，工業區來往人次平均每天可達十二萬，酒樓成為整日高朋滿座的地方，間接使當地的商舖容易吸引消費者消費。

由於早年夜市尚未流行，酒樓就成為一個不錯的消費或滿足食慾的地方。觀塘人普遍消費能力不高，以前光顧的人，都沒有給「貼士」的習慣，他們重視的是實際，不講求形象。所以酒樓雖是社區中必須的消費場所，但同時競爭也十分大。

八十年代初地鐵通車，酒樓市道開始下滑。觀塘很多酒樓都告結業，不少轉為銀行經營，交通改善為觀塘銀行業提供發展契機，漸漸開設了很多銀行，例如匯豐、渣打、南洋商業和集有銀行等。而林珩輝的酒樓，則出售給麥當勞。

林珩輝又曾嘗試在觀塘開設餐廳，卻是一個失敗的經驗。早期觀塘居民的文化水平並不太高，他的餐廳算是高級餐廳，但所提供的餐巾竟有人放在地上踩踏，亦不能收到「貼士」，可見觀塘早期並不適宜開設高檔的餐廳，他的餐廳也只能以失敗告終。

籌建會堂屢碰壁

1981年第一屆觀塘區議會成立時的議員全為委任議員，成員多為地方人士，包括梁式芝中學的校長等不同界別的名人，由港督麥理浩主持開幕禮。先後由徐均平、麥耀堃擔任第一、二屆主席，後來由林珩輝繼任第三屆主席。擔任主席期間他處理了不少關乎觀塘民生的事情，印象最深的是雞寮山泥傾瀉、鯉魚門三家村大火，他不斷安排災民入住公屋和爭取救濟等，非常忙碌。此外有很多社區問題需要處理，如早期居民多自我中心，不理他人，缺乏公德心，公眾地方常見糞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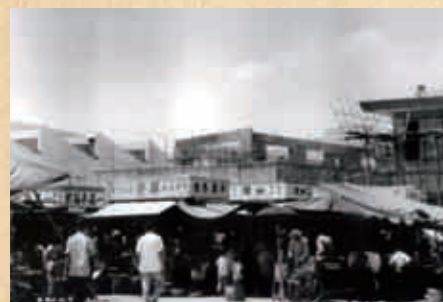
眾多問題中最受居民關注的是興建大會堂。議員曾與市政局主席研究，在數番討論後，只得出一個結論：港府不能在五年內為觀塘區居民興建大會堂，只可興建文娛中心，要求主席作出抉擇，主席又讓街坊決定。港府為了減低開支，只能興建文娛中心。

林珩輝也曾協助居無定所的人及解決家庭糾紛等。最深印象的是有一家三口沒有固定居所，只住在路邊，沒有任何住址證明。不能申請上樓，需要協助。

居民普遍十分團結。居於雞寮的人特別有歸屬感，大部份人都為公家設想。人口中以潮州人為主，從牛頭角道到市中心有八成都是潮州人，潮州人中有最高領導人，能夠團結潮州人。樂華、順利、順安都是較後期建成的屋邨，居民較為明白事理，且教育程度較高。七六雨災時民眾聯誼會的表現最能反映守望相助精神。

問題圍繞裕民坊

林珩輝指裕民坊初期只是一個小型的空間，由直街組成，只有數十個舖位，另有公園、大新銀行、幾幢私人樓宇等。拾級而上可以看到一條通道，本來打算用以登上大會堂，但大會堂計劃告吹，那塊地也有業主擁有，且只可作通道之用，不可用來營商。所以裕民坊能營商的地方不多，地方勢力紛紛霸佔土地開設糖水店、大排檔等。那裏設施不足，污水問題嚴重，民政署又不能監管，幾經辛苦將大排檔趕走，不久又死灰復燃。九十年代裕民坊曾發生火災，政府答允九七前不收地租等費用，但到九七要自動交還政府。那裏現在變得較以往潔淨，多轉為賣乾貨的店舖。



▲ 早期大排檔滿足觀塘區內大量工人的膳食需要，攝於1960年



▲ 侯瑞培先生

侯瑞培先生專訪

見證香港的歷史

侯瑞培先生在1925年於香港出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至今已八十多歲。從日佔時期、觀塘發展、國共鬥爭、的士暴動到今觀塘重建都一一親身經歷，畢生傳奇。

日佔時期他留在香港，居旺角太子道一帶，為日本駐青山道的八島部隊任職汽車修理員，每天得到一斤米。1947年與伴侶共借連理，但由於業主收樓重建必須另找地方居住。政府當時實施「馬標屋」抽籤，合乎入息標準的每戶以一元買一個號碼作抽籤之用。政府以此安置居民。時侯瑞培一家十口生活拮据，所幸抽得牛頭角公屋，轉居觀塘。

和平後，侯瑞培先為政府在九龍山從事汽車維修，每天得二元薪金，繼而從事駕駛，載客到深圳，接著又先後從事警察及的士從業員。成為警察後月薪約一百元，但由於當時「收黑錢」的風氣盛行，加上曾經歷日佔時期的非人生活，對欺負弱小的事十分反感，因而轉行，是為人生第一個轉捩點。

1972年他聯合伍兆祥等人成立觀塘民眾聯誼會，出任副理事長。1984年發起成立的士會。事緣1984年1月12日政府施行的士免首次登記稅，本為良策，但同時增加牌照費，使業界極為不滿。他們在各地組成車隊進行罷工。侯瑞培與杭漢華、文漢榮、戴震邦等人成為的士業界四位代

表，與鍾逸傑等九位議員進行談判，要求取消加價才解散車隊。協議達成後依次從新界、旺角、九龍、香港解散集結的車隊。

他於1985年3月1日成為區議員，月薪二千元，正式放棄成為的士從業員。其後分別出任房屋委員會委員，被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英政府委任為中央政策委員會委員、1997年成為觀塘區區議會主席、2004年成為減罪委員會主席、2006年正式退休。

潮州文化匯觀塘

侯瑞培謂觀塘居民的歸屬感主要來自潮州人。汕頭、潮州等地人士可以輕易到港，他們多為窮困的水上人家，所以大部份只能集中在觀塘居住，只有少部份在香港仔落地生根。潮州人佔了觀塘人口最大比例，他們的團結每每表現在盂蘭節上。觀塘盂蘭節已連續舉辦了三十多屆，從雞寮、秀茂坪、藍田到牛頭角，每年都有大規模的盂蘭勝會，特別是牛頭角八號球場的規模最大。盂蘭節是觀塘文化的最大體現，當時的十個街坊會都是由潮州人組成。1973年以前社會服務主要由街坊會主導，暴動後才由政府基層組織取代，在公屋組織「互助委員會」，又由民政署組成市民「巡更隊」。

他認為觀塘的最大特色幾乎就是潮州人特色，將潮州人的傳統都帶到觀塘。例如：茶果嶺每年也舉辦天后誕。除了潮州勢力外，也有客家勢力存在，未開發前，觀塘多為客家人居住，只是後來才被潮州勢力居上。潮州人多是小販，為工人提供日用品、零食等。又為觀塘帶來「潮州打冷」的飲食習慣。

觀塘居民以民風純樸見稱，團結則是社區的最大特點。這是由於居民來源和族群間的關係，觀塘的主要族群是潮州人和海陸豐人，都有共同語言，重視鄉親關係，有一種「自己人」的感覺。海陸豐人的基地以秀茂坪及牛頭角為主。60年代的潮僑是第一批，海陸豐人成為第二批。由於雙方信仰不同，互不干擾，反而互相幫助。盂蘭節中，潮僑會演出潮州戲，海陸豐則演出粵劇。他們佔了觀塘大多數的人口，十分團結。



▲ 民聯會關懷社區問題，經常商討對策



▲ 由觀塘潮僑工商界所舉辦的盂蘭勝會



▲ 徐均平先生

徐均平先生專訪

徐均平先生由1973年起從事地區工作，1981年就地方行政及房屋等問題，帶領觀塘區議員到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考察和參考當地經驗，1981至1983年擔任觀塘區第一屆區議會主席及政務專員，參與公共事務，興建學校、擔任聯合醫院院董，支持地區醫療工作等。在整個服務觀塘區的歷程中，徐均平指出：「我只是演員，而不是導演」。

首個區議會試點

徐均平指出，一直以來，政府在全港進行很多大型基建工作，但觀塘區內的小規模工程改善不大，如環境衛生及交通運輸等，居民都認為政府沒誠意為觀塘區解決問題，有被忽略的感覺。觀塘區成為區議會試點後，居民的感覺也就得到紓緩。觀塘區是當時香港政府的第一個區議會試點，政府不選擇新界而選擇觀塘，是因為新界本身已有鄉議局，是地方政制的一種，在市區雖然有市政局，但觀塘卻與市中心相距甚遠，而居民普遍感覺該區被忽視。該種新式的地方政制是首次出現的。另一方面，政府選擇在觀塘區推行，是因為觀塘的問題較複雜，區內人口多、工廠多、工人多，低收入人士亦多，居民最需要地區的幫助。

麥理浩身體力行

港督麥理浩爵士認為，香港在回歸後不能分割，因此必須做好實務，推行地方行政，方為務實。區議會成立前，觀塘街坊會是整區的核心，及後功能才漸漸被區議會取代。當時普選對香港政

府來說頗為敏感，居民積極參與區議會的選舉投票，令政府對選舉增強信心，居民按照自己意願選出區議員，是第一次的地區議會選舉活動。從當時試行區議會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區議會的成功，主要因為麥理浩爵士的構想及決心，並落實推行及支持地方政制。

徐均平表示，區議會最主要的角色，是肩負在地區領導的作用，雖然區議會沒有執行權力，但卻鼓勵及推動各有關政府部門互相合作，並通過定期的區議會及工作小組會議，提供非常重要的協調機制，讓各部門一同決定並執行社區管理。在地區層面，屬一個新的行政突破。區議會成立後，初期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安排寮屋戶「上樓」，廉租屋及徙置區是當時的第一批公屋，能解決基本水電供應及改善衛生設施等問題。當時約有四、五萬人住在寮屋等候「上樓」，區議會有效推動有關部門提供臨時水電、衛生設施及郵政服務。另一方面，後巷的僭建物亦需要清理。要解決有關問題並不容易，所以更需要區議會統籌、加強並促進跨部門的合作，以解決地區的問題。

盡全力服務市民

為了改善地方交通擠塞，通過區議會反映地區內的需要，政府在短時間內興建臨時停車場，居民開始體會政府改革的誠意。興建地下鐵路觀塘站對觀塘居民來說是最大的鼓舞，觀塘與香港市區聯繫起來，使居民的心態轉為積極。

觀塘區議會的其中一個目標，是為觀塘居民重建自我形象，通過舉辦觀塘區節等，逐步達成上述目標。同時，區議會也舉辦一些小型活動，如植樹或清理垃圾等，藉以提高居民的自我形象，傳播正面意識，以及優化地區環境。



▲ 港督麥理浩爵士一力促成觀塘區議會成立，他並出席該會第一次會議，圖中對着咪高峰發言的是麥理浩爵士，其左第一位(戴眼鏡者)為觀塘區議會首任主席，攝於1981年(照片由徐均平先生提供)

徐均平擔任觀塘政務專員及區議會主席期間，觀塘區曾舉辦觀塘節，安排舞蹈團到外地表演等，凡此種種都令他感到欣慰。成立區議會時，感受最深刻的是見證香港新地方行政的第一個區議會誕生。區議會可以促進跨部門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溝通和合作。當時民間的組織有互助委員會、撲滅罪惡運動、文康及舞蹈會(文娛康樂促進會)等等，為觀塘地區建立新的機制，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及質素。此外，在選擇觀塘區議會標誌方面，當時有兩個選擇，其一是英國武士的圖案，另一個則較有現代感，在區議會投票時各得相同票數。最終徐均平投下區議會主席的一票，選擇了後者，因為區議會的工作是向前看，不能往後看，較現代感的標誌象徵新的開始。



▲ 曾任可正學校校長多年的馬志強先生

馬志強先生專訪

馬志強先生出任薈色園可正學校校長二十二年之久，位於油塘的可正學校校舍清拆時，學校遷至天水圍。薈色園本來是私人的道教團體，至1965年左右才正式參與社區服務，及後建立「可立中學」，而「可正」則是薈色園主辦的第二間學校。在十多年間，馬志強曾任區議會議員及臨時區議會議員，主要負責區內的社區活動，此外更曾任公民教育活動委員會主席及交通委員會主席等職務。

邊陲落後盡悲情

馬志強憶述，五十年代，觀塘只是個充滿「城市邊緣感覺」的邊陲小地方，從觀塘多個地區的名稱轉變，便能看出其「邊緣」情況，例如「官塘」（官府的曬鹽地方）、「咸田」（鹽場）、「掃墓坪」（掃墓和墳多的地方）、「雞寮」（養雞的地方）等等，反映地區十分落後。

馬志強亦把觀塘形容為「悲情城市」，而觀塘的各類社區問題亦有待改善，因此他十分盼望市區重建成功推行，使觀塘煥然一新。

多逢劫難難埋傷

馬志強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觀塘區的多災多難：六一八雨災、雞寮場山泥、秀茂坪大火、淘大花園SARS疫潮，均是觀塘區發展歷程中的大型「天災」。馬志強憶起，在六一八雨災當日，學校舉行學能測驗，有一名學生在半路途中，不幸遭洪水沖走。雖然馬校長沒有直接參與救援，但亦難掩傷感。

及後的藍田發生火災，馬志強帶領學校發動慈善籌款活動；而在山泥傾瀉事件後，學校亦有參與在全港展開的籌款活動。

社區問題的衍現

戰前戰後，大量難民從內地遷徙來港，大部分難民選擇到觀塘居住，因此早期觀塘出現大量徙置區、寮屋，木屋，早已形成沉重的人口壓力，人口過分密集，必然產生社會矛盾。

馬志強解釋，觀塘為香港七、八十年代的工業基地之一，區內有大量工廠，因此區內的空氣污染等問題甚為嚴重。馬志強指出：「從早期政府已在這裏使用第一批污染探測儀器進行污染探測，便清楚反映問題嚴重。」

由於內地經濟開放，觀塘工廠紛紛北移。以往的工廠多成為寫字樓，貨倉十室九空。區議會與政府商討重新規劃觀塘時，由於與政府規劃的重點和優次出現分歧，未能達成共識。另外，九龍東區各界聯會、觀塘工商業聯合會及觀塘民聯會組成關注觀塘工業區重建聯席會議，邀得專業人士對觀塘工業區進行規劃，建議把工廠區發展成商業、休憩用地；清理海濱空屋（當時未有啟德發展方案），發展成休憩用地等，有關建議同樣沒有得到政府的回應。

馬志強亦慨歎觀塘錯失兩次發展機遇，其一是觀塘八十年代市中心重建，包括月華街等地，有關計劃一直擬備發展藍圖，但由於當時裕民坊業權分散，難於處理，因而放棄計劃；其二是八十年代初期，政府計劃把茶果嶺、鯉魚門等地發展為旅遊區，由於茶果嶺村村民反對和當地地形複雜而放棄計劃，甚是可惜。

此外，馬志強亦表示政府對觀塘地方的規劃設計未盡完善，例如鯉魚門這片海鮮勝地，一直沒有得到良好發展，地上滿是積水，衛生環境惡劣不濟，而魔鬼山上由防空洞改建的墳場，亦因墳場的道路設計問題，只能單線行車，容易阻塞交通，對使用者造成不便。馬志強慨歎，上述規劃模式只會令觀塘的發展停滯不前，問題永久存在。

見證觀塘教育路

馬志強對於觀塘區學校發展有一定的認識。他表示由於七十年代人口激增，因此觀塘不單有七層高的徙置大廈，更有大量十多層高的廉租屋，亦必須興建大量學校。當時出現了「天台學校」，學生都在天台上課。

六十年代中後期，觀塘區內仍有不少「天台學校」分布於各徙置區，如佐敦谷、雞寮（後改名為翠屏）及油塘等。油塘的天台學校有樂善堂學校及曉明學校，亦有部分鄉村學校，如鯉魚門海濱小學及茶果嶺四山學校。七十年代初，政府陸續興建六層獨立式小學校舍，並交予辦學團體開辦資助小學，校舍設有二十四個課室，分上下午學制，合共四十八班，共可容納超過二千名學生，至此，天台學校亦逐步淡出。



▲ 曾天生先生

曾天生先生專訪

開山創始曾家祖

曾氏家族在鯉魚門至今已有七代人，約有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年歷史。曾天生先生自他祖父那一代始立足鯉魚門。他的爺爺到鯉魚門定居後，自行開發。當時，政府不會干預任何人在該地開發。他父親那一代，累積了一定資本，向英國政府申請買地，得到合法的土地持有權。百多年前英國政府向他們徵稅，據曾天生憶述，他的父親指出1904至05年時納稅稱為「創糧」，由英國所遣的百多名印度人為他們註冊、度積、登記、納糧等。

當時流行租借土地，每平方呎土地可收取七毫費用，但當地官員每每要求分取半數收益，不少村民會迎合官府要求，但曾天生的父親不願同流合污，寧可土地自用，所以當政府收地，「補苗不補地」時，曾家蒙受損失，但又不能作聲。

推動教育顯熱誠

曾天生的父親對教育工作的熱誠使曾天生對他滿懷崇敬之心。曾天生七歲才入讀「啟蒙學校」，他的父親擔任校長，得到教育署委任。學校資金不足，聘請教師經費不多，他的父親要私自補貼教師薪酬。教師可每月到他父親所開設的雜貨店領取雜貨。雜貨店貨物包羅萬有，有出售小孩學習用的文具如尺子鉛筆等，更是唯一有食水售賣的地方。及後教師每月可到雜貨店領得三斤米，一年補貼教師三十多斤米，這種補貼方式持續了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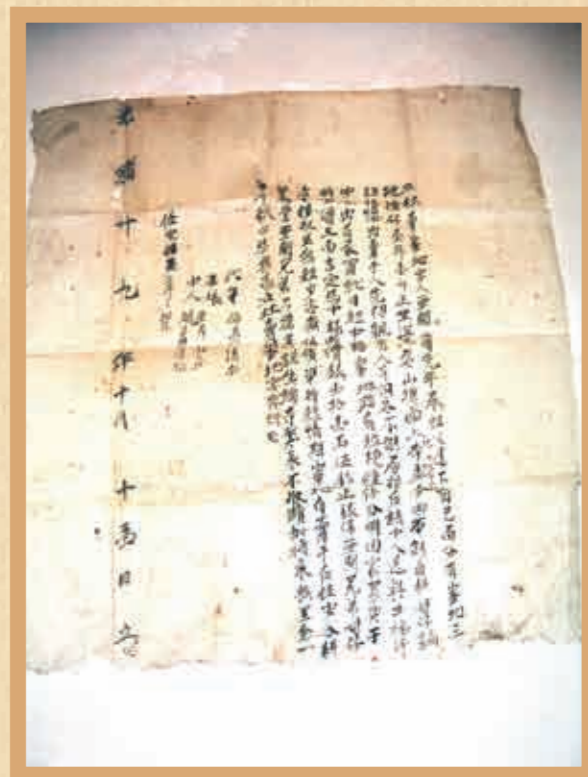
直到啟蒙學校增收學生學費時，經濟困難才得以解決。啟蒙學校學生約二十人，增收學費前，每名學生每學期只需繳交一元五角的學費，一年有兩個學期，所以每名學生每年只需繳交三元學費。後來變為每名學生每月繳交三元，學校每月可得六十元收入。他的父親再也不需要供給教師每月三斤米的額外補貼，而轉為每月補貼三斤油就可以了。

地權爭拗歷時久

七十年代，曾天生與政府發生地權爭奪及遺囑爭執問題。土地位於皇家碼頭(又稱番鬼碼頭)附近，就是今高超道一帶，假若勝訴的話，他便能於七十年代獲得七億鉅款。曾天生沒有能力把事情獨立解決，他找律師傾談，一番商討以後，曾天生必須承諾繳付高達五百萬的律師費，雖然律師對他表示勝算極大，但五百萬在他當時的環境來說是一筆沒可能支付的鉅款，且不保證一定勝訴，曾天生只得放棄尋找律師，繼續以其他途徑尋求協助。

曾天生又到理民府尋求協助。期間理民府曾數度搬遷，從油麻地、新蒲崗、西貢到大埔，理民府聲稱土地業權的相關資料已在日佔時期遺失，在曾天生幾番說明後，他們終承認他所擁有的業權資料屬真實資料，但仍表示無能為力，依然要曾天生自行控告政府。

他曾到其他政府部門爭取，官員懷疑土地業權文件並不是曾天生所有。有人建議曾天生到北京用大清律例打官司，但他最終打消念頭。



▲ 曾天生保存祖先留下來的地契



▲ 曾任小巴司機多年的馮錦全先生

馮錦全先生專訪

馮錦全先生在70年代起，放棄了原先在青山道工廠的工作，到觀塘區成了工廠的廠巴司機，後來又曾做過輔警、電話公司員工及小巴司機。由於工作的特殊性質，馮錦全能在觀塘不同區域中遊走，認識不同階層和不同工作的人，最能了解各行各業的發展。

經歷豐富見聞廣

當觀塘工業發展步進黃金發展期，各大工廠均積極挽留工人時，提供廠巴服務已是廠商採用的基本員工福利。基於在青山道的工廠工作，工時既長又沒有甚麼員工福利，加班又沒有補薪，馮錦全決定轉行，到觀塘為工廠駕駛廠巴。收入較以往穩定，每個月有四百元的收入，但由於工作時間需配合工廠的放工時間，工作時數並不穩定，每天早上約送兩至三班工人回到不同的工廠，但因為每間工廠的加班時間及放工時間也不同，所以他們也要變相加班，每往往也要工作九至十個小時。

服務的對象是工廠區的工人，自然結交了不少朋友，對工廠區也有一定了解。那時候，十一歲的女童已經可以到工廠工作，並沒有所謂的童工問題。工人的待遇雖然不斷改善，但工作時間還是偏長而且工錢低。七十至八十年代，最吃香的工人就是假髮廠的女工，只要她的技術好、工作速度快便能比其他入賺取更多金錢，所以有些假髮廠的女工十分豪爽。有一回，有個假髮廠女工在車上不小心丟了銀包，待人家提點她的時候，她卻表示讓大家拿錢去酒樓大吃一頓。有時候她們的薪金，甚至比司機的薪金還要高呢！使很多司機都感到不是味兒。

女工盼覓好夫婿

以往的潮流和現在有顯著的不同，無論是流行什麼也好，總是以樸實為首要條件，例如唐裝衫。在思想上來說，女工的願望總是劃一的，她們總是夢想自己有一天能嫁得一個好夫婿，從此擁有美滿而幸福的生活。所以她們心中的對象多是一些收入較穩定的男人，例如司機、警察，野心再大一點，就是希望自己能嫁給醫護人員或律師等。

作為司機的馮錦全也曾成為女工追求的對象。每晚放工的時候總有女孩子耐心等候他下班，大家共進消夜，而女孩子也不是刻意的佔便宜，消夜錢還是各自分開付的。由於他早有家室，所以也只得辜負人家一番美意。他們的相處規規矩矩，每每也在十一時前把女工送回家，而且在大樓門口便已卻步。

在巴士上也偶然會發生一些戀情。巴士司機有時會幫助客人上車，男司機少不免會推女士上車，女方會因此感到尷尬而嫣然一笑，不時有些男女因此而熟落、互生情愫，終而結婚。

女工們有這種出嫁的理想，也有些能夢想成真。她們最盼望嫁給太子爺或大老闆。他的一個老闆就是這樣滿足了不少女工的夢想，他到處設廠，每到一個地方，設了一間廠房，就會迎娶一位女工為妻子，協助管理工廠。這裡包含了一種用人的智慧，妻子是工廠的女工，已有一定的人事脈絡，可利用這層關係來有效控制工人，而且妻子介紹的人必然較可靠，在有嬌妻的同時，又能有效掌握工廠中的情況，是這個老闆的如意算盤。

大巴小巴多磨擦

小巴與巴士的司機經常會有磨擦。巴士司機經常認為小巴司機不守規矩，與他們競爭客人，而小巴司機卻反過來認為巴士司機不守規則，且以大欺小，彼此抱有敵視態度。由於馮錦全曾是小巴司機，所以十分清楚小巴司機的心情，要說競爭，以當時的環境來說，小巴的票價比巴士貴，所以根本無法比拼、在競爭中得不到益處。

巴士與小巴的爭執多是為了「靠站」的問題，小巴在法律上的地位十分低，很多時候到巴士站「靠站」也被捉。馮錦全曾有過這樣的經驗，當時有兩位警員截停了他的車，乘客全都要下車，車子留在車站，而他則跟警察到警署，車中留下被稱為「蛇仔」的助手。「蛇仔」雖然有「仔」字，但不一定是男性，主要負責幫忙找客及看管客人上落安全，馮錦全的助手就是他的妻子，是當時常見的「夫妻檔」。

車上危機時常有

治安方面，小巴較巴士安全。因為巴士乘客較多，經常有非禮及偷竊事件。馮錦全也曾在巴士上遇到了小偷。有一回，他乘坐巴士時抱著女兒，感覺到自己的袋子在震動，起初以為是女兒頑皮之故，後來才發現有一位男士與他站得十分接近，馮錦全捉著他的手，好言相向地問：「先生你是不是找錯袋子了？」那人還不死心，馮錦全於是警告他放手。他沒有再追究，否則整車的人都得留下等候警察到來，肯定會遭人責罵。不單車上如此，一般人對罪案的發生都不太上心，每有人因事借用電話，店舖多不願借出，因為警方必會追查電話的來源，同時證實報案屬實才讓電話掛上。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但乘客會遇上危險，連司機也會有危險。尤其是駕駛九座位小巴被認為是一個三山五嶽的行業也有它的道理。經常

聯合醫院非首選

基督教聯合醫院，被認為是觀塘人的唯一醫院，但原來早期觀塘居民生病時並不以聯合醫院為第一選擇，主要依靠的是社團診所及醫療所，醫療所中很多醫生都沒有牌照，因為得不到英聯邦的認可。當時，無論是美國、台灣、中國大陸等地的合格或受訓醫生也不被認同。這些被認為不合資格的醫生在市民心目中往往醫術高明，被稱為「大陸醫生」，例如當時九巴的觀塘駐診醫生也是「大陸醫生」。

那時候的人不太願意到聯合醫院求診，因為所需的金額只有少數人才能負擔。加以輪診時間極長，經常要通宵排隊。相反，「大陸醫生」相較於正式醫生卻十分便宜，診金多為十多元至三十多元。另有所謂的「贈醫」，就是指不收取診金，但指定人們買藥的地點，藥房會分佣金給那些贈醫的醫療所，有時亦會哄騙人買名貴藥物進補。

惋惜中也感欣慰

馮錦全看到觀塘逐步實現現代化也感到開心，卻同時慨歎文化特色的消失。現在的神功戲因噪音關係被安排在偏遠地方舉辦。秀茂坪的大聖誕也變得小規模及舉辦疏落了。夜市也同時消失。一些特色美食如炸豬腸、糯米飯等都不常見。十多年前的「民記」小食店(今人和荳品廠位置)，從街邊檔搬到店舖，但由於沒有牌照而結業，實在十分可惜。

但不幸中之大幸，孟蘭勝會、天后誕等，每年仍可舉辦並得以保留。另外，有南苑酒家作為碩果僅存的歷史見證，亦成為了他和朋友喝酒聊天、與妻子拍拖的回憶舊地。

馮錦全在區內最喜歡的地方就是魔鬼山，以往每天工作前都會先到那裡看日出，那時還沒有正式的路可以通往，要爬山才可以到達。山上可以看到觀塘的部份地區如秀茂坪、藍田、機場跑道等。但他不敢到炮台那裡，因為有蛇出沒。

字花娛樂受歡迎

七十年代的賭風極盛，最受歡迎的賭博方式是「字花」(又稱「花會」)。即使家庭主婦也參與其中，她們在買餸時都會路經裕民坊兩側的字花檔，常用剩餘的零錢買字花，由數角至一元不等，買一元對她們來說已是十分大的賭注。字花檔檔面簡單，只擺放了椅子及箱子，方法是由「字花廠」預先決定每期開出的字花，揭曉時間一到，便透過小巴將訊息通知全港的字花檔。而決定字花者必須具有一定學識，熟悉三十六古人，精通詩句，人稱「字花師爺」。參與者可以在三十六古人中挑選一個，買中的話就是一賠三十。

報章往往也參與字花賭博，它們會在報章上刊上每期字花的提示，包括漫畫及文字方式，以提昇報紙銷量。馮錦全最深印象的一個字花提示是：「誠因似開心，老是似鮑魚」，字花就是吉品。字花是全港一致性的活動，有時會在旺角開出字花，然後由小巴將結果通報各地，電話出現以後就更方便。次日報章亦會刊出開出的字花。

但開字花的過程中，往往是一個騙局，負責人看哪一個字花少人下注就開那個，不少人因此致富，即使東窗事發，他們也能輕易逃脫，甚少因此惹禍。青年人也有另類賭博方式，例如「估銀仔」，將錢放進一本厚書裡，數人輪流翻到某一頁，翻中的話錢就屬於那個人，不中的話則有其他懲罰，此外又有拍「公仔紙」、「數花」等賭博方式。



▲ 早期徙置大廈的設計有利鄰舍關係的建立(照片由周耀明先生提供)

旅行聯誼成風氣

參加工會活動是那時候少數正當娛樂之一，當時的工會並不是人人可以加入的。羊毛工會、紡織工會等多屬左派工會，為工聯會前身。有些則是公務員的工會，如水務工會等，他們都有特定的會員入會規格。工會常舉辦旅行，參與者會帶同煮食用具等用品，煮成多人份量的粥、麵、飯等共同享用。

當時，除了下棋和踢波外，能夠外出吃飯已經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旅行亦然。馮錦全經常舉辦朋友間的聯誼旅行，曾到過鯉魚門天后廟附近，享受幽靜的環境。以往鯉魚門的酒家十分簡陋。一些用棚架築成的店舖，在當時來說已十分奢豪。他們要到海邊的檔攤自行選購海鮮，店舖只收取加工及燃料費，烹調出巧手小菜。一般人只到鯉魚門的大排檔吃，在空地上擺滿了桌椅，天氣壞時則加上帳篷。價格方面，比例上與現今沒有太大分別，到鯉魚門吃海鮮的都是富裕人家，也算得上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出現的情況就是有些不良份子會走出馬路撞向小巴，聲言受傷並要求賠償。這時候司機必須以強硬的態度把他們趕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恐嚇」他們要送他們到醫院去，使他們知難而退。

有些乘客會在尾班車上打劫司機。如果有客人到了總站還不下車，那麼司機就要小心了，若果客人要求加錢要司機送他往另外一個地方，司機絕對不能上當！不小心或新入行的司機，可以在一個月之內遭人襲擊上兩次。馮錦全遇上最驚險的一次是小巴在新界開往觀塘的途中，發現車內有人打劫，便不動聲色，把車駛到荃灣警署門口，響號通知警察，將壞人嚇跑，但那人始終沒有落網。事後他擔心會受到尋仇報復，幸好沒事發生。

住屋雖陋情味濃

觀塘區守望相助的精神曾經為人所稱頌，但隨著社會的轉變，馮錦全也不得不慨嘆這種精神已變得十分薄弱，戶與戶間的關係變得疏離。這種鄰里關係最濃厚的時候，就是徙置區和廉租屋最普遍的時候。廉租屋在走廊戶戶相對的特色，使居民為了空氣通爽而不關門，兩家人因此而互相稔熟。有時到街市購物也會要對戶幫忙看管孩子，互相幫助是很自然的事。

馮錦全一家住在高超道數十年，他憶述初時油塘一帶十分荒蕪，無路通到鯉魚門，必須繞一個圈才可到達。他之所以搬到順天邨，是因為當時高超道的樓宇都是「咸水樓」，只有十七年樓齡已需拆掉。居住環境不算太差，卻十分擠迫及不方便，由於面積有限，只有一百八十方呎，卻住有四個小孩及夫婦二人，因不能間房極不方便。油塘邨中的樓宇有部份是H型、長條型，治安方面普遍較差，被經過的人拿走煮食器具也是常有的事情。所幸的是他們與鄰居的關係十分密切，男人為了謀生而早出晚歸，經常只有妻子和小孩在家，兩家人經常會聚在一起吃飯或交換飯餸，電梯碰面時也會互相打問候。